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6]

文学卷

严绍璗 中西进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6]

文学卷

严绍璗 中西进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策 划：张宪章
责任编辑：张宪章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韦 伟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文学卷
严绍璗 中西进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5 字数 31 万 印数 1—2 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169-3/G · 290 定 价：27.00 元

本书系由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日本国大修馆书店共同出版
中国版(中文)的专有出版权归浙江人民出版社所有
日本版(日文)的专有出版权归大修馆书店所有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编辑委员会

中国方面

主编 周一良

副主编 严绍璗 王勇

编委 (以中文姓氏笔划为序)

马兴国 王 勇 王晓秋 李廷举

刘俊文 严绍璗 杨曾文 周一良

日本方面

主编 中西进

编委 (以中文姓氏笔划为序)

上原昭一 大庭修 中西进 吉田忠

池田温 宫田登 源了圆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文学卷

主编 严绍璗 中西进

著者 (按撰写章次为序):

严绍璗 序论:中日文学交流的历程与我们的研究

第一章 神话世界中的中日文化融合

第三章 日本古代物语与中国文化

中西进 第二章 日中诗歌的本体与形态及其比较研究(戚印平译)

刘雨珍 第二章附:和歌、俳句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诹访春雄 第四章 日中古代戏剧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宋鸿志译)

王晓平 第五章 日本前近代小说的勃兴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山田敬三 第六章 日中近代文学的形成与因缘(刘雨珍译)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序

周一良

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日本大修馆书店合作，分别用中文日文出版《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我谬蒙推为中方主编，虽曾参与擘画，而年来精力就衰，势难始终克尽主编之责。但是，对这套书仍觉有必要谈一点感想。

首先，这套书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学术界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意图。每卷都是中日两国学者合写，各自从不同侧面阐述本卷主题。用这种密切配合分工合作的方式写文化交流史，恐怕还是本书首创。各个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或互有联系，或各自独立，其间并不要求整齐划一，而是百花齐放，起交流作用。书名交流史，首先在写作方式本身就贯穿了标题的精神。而且，由于两国学者分别执笔，各自掌握充分资料，因而更利于贯彻本书宗旨——阐明文化交流自来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再从撰写方式来说，本书执笔人有学界耆宿，有史坛新秀；而更多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用我国说法，叫作老中青三

结合，这是又一意义上的合作。

其次，本书内容涵盖面比较广阔，计分十个方面：历史、法制、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科技、典籍、人物，不愧大系之称。有些部分，在一般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如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某些部分通常交流史中较少提到，如法律、科技。至于民俗与典籍这两个部门，自来此类著作中更是绝少涉及。由这十个门类，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时代之久，方面之广，相互影响之深，相互关系之密，世界上几乎任何两国之间都难于比拟。

本书试图用浅近笔调表达学术性内容。各卷包含的专题大都为作者研究所得，但为保持各卷主题的体系，作者大抵采用点面结合办法，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面上亦有必要的相应的叙述。因此，本书既可供专业人员参考，也适于一般读者阅读，此感想之三也。

是为序。

1994年9月15日写于北大燕东园

目 录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序	周一良(1)
序论：中日文学交流的历程与我们的研究	(1)
第一章 神话世界中的中日文化融合	(16)
(一)中日神话的类型研究	(17)
(二)中日神话中“二神创世”的比较研究	(27)
(三)日本“天孙降临”神话与中国文化	(43)
(四)中日“物崇拜神话”的形态及其共质研究	(56)
(五)结束语——“变异体文化”的概念	(65)
第二章 日中诗歌的本体与形态及其比较研究	(67)
(一)诗歌的本体	(67)
(二)诗歌的形态	(73)
(三)中国诗与和歌	(79)
(四)日本汉诗的创作	(85)
(五)汉诗与俳句以及新诗	(93)
附：和歌、俳句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100)
第三章 日本古代物语与中国文化	(118)
(一)汉文传奇《浦岛子传》的研究	(119)

1. 文本的研究	(120)
2. 出源的研究	(127)
3. 媒体的研究	(146)
4. 主题的研究	(165)
(二)《竹取物语》的研究.....	(174)
1. 对《竹取物语》篇名的再认识	(175)
2. 赫映姬的诞生与“竹生殖”	(180)
3. 赫映姬的婚姻与中国的“竹”传说	(191)
4. 赫映姬的身份与中国日月神“新神话”	(202)
(三)《源氏物语》的研究.....	(212)
1.“皇后学”的兴起与紫式部的登场	(213)
2. 中国文化在《源氏物语》创作中的意义	(219)
第四章 日中古代戏剧的交流与比较研究.....	(240)
(一)散乐.....	(240)
(二)《傀儡子记》的视野.....	(256)
(三)傩戏与能.....	(264)
(四)中世民间神乐与傩.....	(279)
第五章 日本前近代小说的勃兴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285)
(一)从“唐话”研究起步的日本前近代小说学	(288)
(二)“读本”作者对明清小说的“翻案”.....	(311)
(三)“读本”作者对明清小说理论的接受与研究.....	(328)
(四)曲亭马琴与明清小说批评.....	(351)
第六章 日中近代文学的形成与因缘.....	(372)
(一)近代文学的成立——文化流向的逆转与言文一致运动	(372)
(二)近代文学的展开——文学结社与文学流派.....	(385)

目 录

(三)左翼文艺的交流——“纳普”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399)
(四)“战争文学作家”的表里——石川达三与火野苇平	(406)
(五)台湾被侵占时期的文学——被忘却的作家们.....	(418)
(六)中国作家的留日体验——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	(421)
中文版编后附志.....	(432)

序论：中日文学交流的历程 与我们的研究

中日文学关系，自古以来始终洋溢着中日两大民族心灵交流的生动气息。它是世界文学关系中一个复杂而又独特的存在，更是构成中日文化关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当此次中日两国学者议定共同编写《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时，文学的交流，便自然成为《大系》的一个卷目。

本卷由中日双方主编商定大纲后，分别约请两国有关学者分工撰写。两国学者各展所长，从不同的视角各抒卓见，以不同的笔法表达研求所得，可谓群芳争艳，精彩纷呈而新人耳目。有些篇章系从受容者的角度展开论述，探源溯流，读来亦别是一种感受。本书意在求其探讨的深入，无意于刻求历史意义上的全面、完整，然从篇章的编排、全书的内涵，亦不难窥见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由于两国多人合著，在学术观点上存在某些差异，对有的问题的评述或存在与我们所常见的有相异之处，这是势所必然。不同观点的争鸣正是繁荣学术的前提。

(一)

本卷内容，起自神话时代，讫于现代，其间绵亘两千余年。这

岁月漫长的史实,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中国文学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历史意义,也展现了日本文学与文化自古以来所具有的国际化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东亚文化灿烂的一页。

中日之间的文学接触,最早大概是通过“人的接触”来实现的。所谓“人的接触”,指的是在那样一种几乎不存在任何传媒的文化背景下,文学的传播完全是依凭人种的迁徙在无意识中来完成的。日本“记纪神话”中可以解析出内涵丰富的中国秦汉文化与文学的因素,这便是依靠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6世纪中国大陆向日本列岛的移民来实现的。此种长时期持续的、层面广泛的中国移民进入日本列岛,使正在这一列岛上形成中的本土文化(当然包括文学在内)从原始时代起,就面临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随着人种的融合,此种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也就转化成本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因素。或许正是由于持续不断的人种融合,持续不断的外来文化的转化,这样就成了日本本土文化与文学消融外来文化与文学并使其转化成自身发展养分的内在机制。这便是日本文化与文学从原始时代开始逐步形成的“变异”特征。

日本的书面文学,最早出现于8世纪。就其文学的样式而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开创了日本的散文文学;《怀风藻》和《万叶集》开创了日本的韵文文学。但是,在公元8世纪的时代,因为还没有形成与日本语言相一致的日本文字,所以,无论哪一种文学样式,都是依靠汉字来表现的。当时使用汉字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借用汉字来记录日本语的音,可以《古事记》和《万叶集》为代表,它们开创了日本的“和文文学”;一种是借用汉文的形态,用汉文的文法组成汉文文体,可以《日本书纪》和《怀风藻》为代表,它们开创了日本的“汉文文学”。当然,无论是“和文文

学”，抑或是“汉文文学”，它们都是日本文学。

日本书面文学形成之始的这些形态特征，已经注定了它与中国文学之间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8世纪时代，就文学发展的主体而言，以“汉诗”为代表的日本汉文文学要比和文文学更趋于繁荣和昌盛。此种文学势态对和文文学形成的压力与挑战，当不难理解。作为早期和文文学的代表，主要是不受节律制约的、以自由音素形式表达的“和歌”。处在当时的文学氛围中，自由和歌为了取得与汉文文学相抗衡的能力，它没有在绝对意义上采取“排异”的做法，而是加倍地努力，从日本汉文文学及它的模本中国文学中吸取适合自身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从中国的诗论与诗歌创作中，寻求对自身本土自由和歌进行规范化节律制约的可能因素，并相应提高和歌的歌论。此种吸取，已经在自觉的层面上进行的。经过数代歌人的辛勤耕耘，自由和歌逐步形成了定型的“三十一音素律”。《万叶集》的各类和歌，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中日文学的这种接近；《古今和歌集》则显示了这种接近所产生的辉煌成果，从此创造了其后千余年和文中韵文文学的灿烂成就。

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此种联系形态，我们称之为“在排异中实现变异”。这是古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相关联的最基本的模式，它渗透于各个时代与各个层面。10世纪左右，和文文学中形成了“物语文学”。这是用假名创作的古小说文学样式，也是和文文学中第一次实现“言”与“文”统一的文学样式。“物语”的出现，使和文文学更加丰满。12世纪初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是世界上第一部写实性长篇小说。然而，“物语”的产生却是经历了与中国文学交流并从中汲取营养的漫长过程。在“物语”之前300年左右，有一种可以称为“汉文传奇”的文学样式出

现于日本文学之中。它是从神话、传说中脱出的文人的虚构性创作。他们从中国秦汉至初唐的文化与文学中获得营养，又从日本本土文化出发加以改造，成为日本文学中古小说的最初雏形。中国的唐人传奇后来是向着文人文言小说的方向发展，而日本的“汉文传奇”却是向着口语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加入了愈来愈多的和歌韵文成分，这便显示了此种“汉文传奇”的日本民族化进程。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浦岛子传》便是这一演进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日本学者一般把《浦岛子传》作为“传说”看待进行研究，那是因为日本文艺学上没有“传奇”这个范畴。然而，缺少了这一个范畴，就失落了“物语”形成的一个阶段。目前学术界公认《竹取物语》是日本物语文学的第一部作品。但也诚如有些学者所认定的那样，在今本假名《竹取物语》之前，极有可能还存在一种或几种“汉文”或“准汉文”或“汉文体”的《竹取物语》。实际上，我们可以勾勒出物语文学形成的基本轨迹：神话与传说—汉文传奇—准汉文（或汉文体）作品—假名物语。

定型和歌与物语文学，其内容上常常有许多来自大陆中国文化与印度佛典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日本作家将其与本土传统混合处理，运用日本的美意识融会贯通，于是便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日本文学形象。有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者，常常指摘日本文学作品既使用了中国文学的材料，又歪曲了中国文学的形象，他们欲求在日本文学中看到“原本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文学采撷中国文学的材料，并非有意于再现中国文学的美意识，而总是从表现自身美意识的需要出发来理解和处理中国文化的材料的。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在多层面上采撷了唐代白居易的文学材料，但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来说，每一个层面上几乎都是一个被“歪曲”了的白居易。实际上，

当日本文学从中国文学中采撷相关的材料时，它总是从自身的美意识出发，对中国文学作了一个“不正确的理解”。只有建立在这种“不正确的理解”的基础上，日本文学才有可能从中国文学中获得它自身所需要的养分。两个不同民族之间文学的传递，如中国文学之至于日本，希腊古典悲剧之至于法国，大致都处在这种“不正确的理解”的状态之中。日本虽然地理上僻居亚洲东部的海岛，然而，它的文学同样表现了世界文学所共有的本质特征。

中日文学间的关系，从早期开始就呈现出双向交流的形态。大约在8世纪，当自由和歌正在向定型和歌演进的时候，具有“三十一音素律”的和歌传入了中国。14世纪“假名”也传入了大陆，并出现了实用性“寄语”的编纂。这就使日本文学作品的汉译成为可能。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李言恭、郝敬编纂的《日本考》中，已经有了51首和歌的汉译文，当时的译者，不是把两种不同语文的移译称为“翻译”，而是名之为“切意”。这意思是说，不同语文的移译，只是切其意而已。这实在是表现了中国早期的日本文学译者对“翻译”含义的深切理解。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这大概是除了佛典的汉译外最早的外国文学译本了。

古代日本文学对中国的传播，其渗透力度虽然比不上中国文学对日本的传播，但是，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一定的时限内确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文学中的“汉诗”，虽然模本于中国诗歌，但是它却从自身的创作“反馈”(feedback)于中国的文坛。五代人江为、明代人孙蕡等的“绝命诗”，元代人萨都刺的《天满宫》等，都是属于日本汉诗的反馈形态作品。此种接受日本汉诗反馈而再创作，一直延续到现代。如毛泽东青年时代有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

无处不青山。”此诗内容昂然向上，格调高远，具有极强的美意识情感。据卢永麟教授考定，此诗源出于日本明治初期倒幕维新志士村松文三之作，亦意味深长。^①18世纪清代康熙皇帝的大臣曹寅，于1709年创作了杂剧《太平乐事》，全剧共九出，并有一“开场引子”。其中有《日本灯词》一出，内有曲牌五支，起首一曲《金字经》，采用汉文中间杂有日文来填词，后四曲全部采用剧作者自认的日本语发音的谐声字填词。如“山”填为“阳脉”（日语yama），“秋”填为“阿氣”（日语aki）等，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作家使用日本语文进行创作。由于曹寅并不真正懂得日本语语法，所以《日本灯词》至今还不能完全解读。即使如此，这一创作在中日文学关系上所具有的意义却是极为突出的。

（二）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学交流，虽然两千余年来绵亘不断，但是，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却并未对这一辉煌的文学现象进行过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更没有进行过学术性的定位。据《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的报告，在从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间，中国公开发表的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文学”的关于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论文，只有1927年发表于《小说世界》第16卷14期的查士元《中日神话之比较》一文。^②

人们或许会感到震惊，也感到困惑。中日文学的交流绵远而深广。日本文学自8世纪开始传入中国，16世纪以来出现了和

① 《北京大学》（校刊）1993年10月30日第3版。

②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